

一位廉州籍高级干部的“先进事迹”

花草树木“墙内外开花墙外香”，人也一样。明朝嘉靖年间的钟振，是土生土长的廉州人，但当地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异地为官、上书入传的廉能之吏。

明清两朝，廉州府乡试共出过一百五十一位举人，常科考试中有进士十九名。但这是“不完全统计”，比如进士中不包括皇帝登基、生日等“非常科”录取的恩科、赐授之类。

此外，明朝从朱元璋立国（1368年）起，到明宪宗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廉州府曾设立石康县，其间一百多年，举人进士的名单上一个廉州籍的都没有。

总的来说，地僻民穷的廉州府功名寥落，“出人”不多。能考上举人、进士的都是堪称人中龙凤的佼佼者。

史书中没有钟振乡籍和出身的记载。只知道他在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由府里推荐参加进士考试，翌年考上二甲进士。他任过朝官，也辗转多地当过地方官，官声斐然。

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，科举是官员的正途出身。一般来说，一甲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都进翰林院，二甲、三甲的进士，经过“试用期”（观政）后任实职，或者是在中央机关任给事、御史、主事、中书、行人、评事、太常国子博士之类，相当于处级或正科级的主任科员；或者外派到地方任知县、县丞、推官之类。

钟振考中进士后，先是“知滁州事”。这个职务相当于县处级干部，正七品官，但相对更重要一些。史书称他“亟除夙弊”，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。但才干了六个月，因为父亲（或母亲）去世离职回家守丧（寻以忧行）。

按照礼制，父母去世要守丧二十七个月，但位子却不会留着。重新“出山”（起复）即使有空缺，还得有人推荐。钟振获得推荐，补了安徽广德知县的空缺，后来又调到江苏嘉定县。

无论是在滁州，还是在广德、嘉定，他任过职的地方，都建有生祠铭记他的德政。

许多人都知道大太监魏忠贤立生祠留下千载骂名，其实为职官立生祠从汉朝就有了。对有德政的官员，“民甚恋慕，共为立生祠，塑其像，以广其报”，与“德政碑”“去思碑”是同样的路数。

历史上立生祠的情况十分复杂——本来对为官一任者的评价就不是非黑即白，由于立祠泛滥，名不副实的不少。但不可否认，作为对官员的一种鼓励和旌表制度，并不是所有生祠的受敬奉者都是不够格的。

上述几处生祠，记载着钟振做过的事：盘清当地的田亩家底，摒除溺死女婴的陋习，开辟市场，疏浚环绕学校的水渠，祭祀水神禳灾祈福，组织抗疫，禁革师公巫婆迷信活动，大力兴建学校，还修建了一个九龙滩水利工程。

由于钟振实施这些善政，任职的地方出现了麦子开双穗、竹子并生六节等吉象。

古人讲“天人感应”，德政感于天，民众喜欢拿这些东西来渲染，不必太过当真。但将这些祥瑞附在谁身上，一般来说这个人都是做了好事，是公认的好官。

钟振后来“擢守云南”。云南地处西南边陲，当地民智不开，教化不到，他发布通告，推行礼仪，移风易俗，鼓励垦荒耕作，发展蚕桑业，从严执法，不办“关系案”“人情案”。还曾因平定

部落造反，获得皇帝表彰奖赏（持法毫不假借，以靖猾功褒锡勋赠）。

古代志书的记载，大都比较抽象，修史者像现在一些人写材料喜欢对仗和用排比句一样，玩弄词藻，多用骈文，缺乏具体的事例，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那么生动的极少。不过做过的一些好事，还是可以从中找到旁证。

尽管钟振官当得不错，但他的仕途并不顺，他当过“民政部司长”（户部郎中），最后升到正四品的福建按察司副使后，弃官回家，原因是“介性忤时”，也就是性格耿直，不合时宜，触犯了上司。

告老回家后，他并没有闲着，专心致志地做起了编辑地方志的工作。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，他编纂了一部《廉州府志稿》（手较郡乘，悉于旧志）。

传于后世的崇祯版《廉州府志》，就是兵巡道张国经以钟振的书稿为蓝本修编而成。张国经饮水思源，给钟振的故居题写了“文献遗风”的匾额。

钟振除了编纂府志，还应邀为在廉州任职的官员写过两篇碑文，一篇是《掌教林侯去思碑记》（见《以德服人的“林校长”》）；另一篇是《郡守星冈王公遗爱碑》（见《三月“短命”知府，民众勒石铭碑》）。他借评价和褒扬在家乡受到民众怀念的好官，表达自己的为官理念。

钟振显然是喜好“舞文弄墨”之人。他回乡之后，寻芳探胜，流连地方风景，到过合浦闸口的仙人桥、北流葛洪炼丹的勾漏洞，还游览了十万大山，留下了一些咏诵山水风物的诗歌。